

身份预支：编制作为未来承诺的提前兑现装置

——兼论“体制内”何以成为一个跨代际的债务网络

作者 刘言言 · SDE 学员 · 约 2.9 万字 · 发表于2026年7月29日

摘要

中国社会对编制的执念，长期被既有研究分别归因为制度保障、理性选择或文化惯性，但这些解释共享着一个未经审查的预设：身份是某种可以被个人“持有”的稳定实体。本文撤销这一预设，提出一个不可还原的新命名——“身份预支”。编制之所以拥有其他职业身份不具备的深度吸引力，不是因为它提供了更稳定的当前安全，而是因为它是一套将“未来”这一不可逆的、不确定的时间维度，在当下提前兑现为可被感知的身份确定性的装置。房贷审批不是在为一份当前的工作估值，而是在为“你的未来不会出错”这个承诺贴现；婚恋市场不是在匹配两个人当下的条件，而是在预支两个人共享的未来身份保障；代际期望不是在推荐一份职业，而是在逼迫子女预支尚有数的青春去换取父母记忆中已断供的未来图像。编制因此不是一个身份，而是一张被国家信用背书的“未来支票”——而这张支票的兑付代价，是个体将自己的今后余生作为无形质押物，提前抵押给了那个提前给予他确定的制度。本文进一步揭示，这种预支并非单向的恩赐：通过一个贯穿全文的十年追踪案例，论文逐层展示了“自我评价权的丧失”不是预支的最终产品，而是在每一次主动的、在当时看来完全合理的选择中被结算出的下一轮前提——本文称之为“体质化剥夺”，以区别于被动的“规训”。思想实验进一步揭示，三大兑现接口中，房贷审批具有底层接口地位：一旦它被关闭，另外两条即使不动也会逐渐松动。编制失去预支能力之后，将回归为一份普通工作。在理论对话上，本文逐一回应了布迪厄的元资本理论、经济学贴现模型、福柯的规训理论、戈夫曼的总体机构概念、卢曼的系统信任理论以及商业“可购买安全”方案的挑战，论证了“身份预支”在每一种对话中都切开了既有概念无法覆盖的新辨别面——尤其是在与规训理论的对话中指出，预支的权力不再依赖持续的监视与考核，而是靠一次性签发的未来支票在多重社会接口上的连续自动兑现，让个体自己替系统持续看守自己。在论文边界上，本文通过简要的国际比较论证了终身雇佣的制度外壳并非中国独有，但三大接口的同时高烈度耦合——下岗潮的代际创伤、住房商品化改革后编制身份与信贷风控的制度性捆绑、社会职业评价体系的相对单一化——才是中国“编制崇拜”烈度独异的深层结构性条件。其核心命题的证伪条件是：当一个社会的金融、婚配、代际评价不再将“未来确定性”作为可提前兑换的通货时，编制的吸引力将回归至一般职业的正常水平。

关键词 编制；身份预支；未来兑现；体质化剥夺；发生学分析

一、重新提出一个景观

中国社会对编制的执念，早已不是需要论证的事实。每年数百万人涌向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考试，一个岗位牵动数个家庭的神经，“有编制”在婚恋市场上是带着刻度的硬通货，“考编上岸”已从一个隐喻凝固成一代人的人生纲领。对这一景观的既有解释，通常从三个方向展开：制度主义将其归结为社会保障的刚性差距——编制内外的养老金替代率、医保报销比例、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存在显著差异（参见李强，2016；郑功成，2018）[1]；理性选择理论将其理解为风险规避的最优策略——在市场化改革不断释放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个体倾向于选择风险最低的职业路径（参见周其仁，2017）

[2]；文化解释则将其追溯到科举传统与士大夫情结——千年来“学而优则仕”的文化惯性在当代的制度化回响（参见金耀基，2019）[3]。这些解释各自抓住了某种真实的东西，但其共享的预设同样清晰——它们都默认编制是一份因为“更稳定、更安全、更有面子”而受欢迎的“特殊职业”。

然而，这个预设一旦被作为起点接受，就自动遮蔽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稳定”“安全”“面子”这些属性，会在当代中国社会里如此集中地、持续地、压倒性地绑定在“编制”这一个具体的制度安排上？为什么这些属性没有分散地附着于其他职业身份——比如一个长期执业且信誉良好的律师、一个拥有稳定客户群的独立设计师、一个在某个细分领域积累了深厚技术的工程师？如果稳定是所有人的刚需，那么市场理应早就给出了替代方案——高额商业保险、多元化资产配置、职业声誉的积累。近十年来，中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快速增长，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参见《中国医疗保障发展报告2023》）；家族信托业务在高净值人群中逐步成熟；部分互联网行业甚至出现了跨公司的职业年金互认试点。但是，这些替代方案为什么始终未能撼动编制的独特地位？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停留在“编制提供了更好的保障”这一层面。因为这一判断预设了保障是某种可以像财物一样被“提供”、被“持有”的东西——你有了编制，你就“有了”保障；你没有编制，你就“没有”。这套“持有”逻辑贯穿了几乎所有既有解释：制度主义说编制持有更好的福利，理性选择说个体持有更低的风险，文化解释说编制持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它们的句法结构惊人地一致——“编制是X（的载体）”。而本文要问的恰恰是：如果编制不是任何既有事物的“载体”，而是一个“提前兑现装置”——它不是在当下给你某个你可以“持有”的东西，而是把属于未来的某种确定性提前拿到今天来让你使用——那么，“编制崇拜”的解释将不再是一个关于“当下拥有什么”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未来被如何提前支取”的问题。

本文的核心命题由此得出：编制不是一份职业，不是一个福利集合，不是一个身份标签。编制是一套将个人不可逆的未来时间提前贴现为当下身份确定性的制度装置——一套“身份预支”系统。一个人考编上岸，不是获得了一份工作，而是从那套装置里提前支取了一笔名为“今后余生不会出大事”的未来承诺，并用这笔承诺作为通货，去银行、去婚恋市场、去父母面前、去自己心里，兑现为此时此刻可感可知的身份安全感。这笔承诺不是免费的——它的代价，不是考编那几年的青春，而是今后几十年的“不得质疑”：一旦他停止相信这张未来支票有效，他迄今为止用这张支票买来的一切——房子、婚姻、父母的认可、自我的宁静——都将因为平不了账而陷入崩盘的危险。编制因此不仅是一个社会位置，更是一张被国家信用背书的跨代际债务网络——进入这个网络的人，在同一个动作里，既获得了未来承诺的提前兑现，也背上了用余生为这张承诺做质押的隐形债务。

在展开论证之前，需要先澄清贯穿全文的核心概念。“身份预支”不是隐喻，而是一个可被操作化分析的发生学概念。它包含三个相互咬合的构成要件：第一，一个“未来承诺”——一个将未来的某种确定性提前承诺给当下主体的制度性安排（如终身雇用、养老金替代率、体制内身份的可共享性）；第二，一套“兑现接口”——一系列能够让这个未来承诺在当下被识别、被估价、被兑换为现实利益的社会制度（如房贷审批、婚恋市场、代际评价）；第三，一条“债务锁链”——在预支身份的同时，同步产生的“不得质疑”的心理约束和“不能退出”的社会约束，使得接收预支的主体在获得确定的同时，丧失了重新定义自身价值的能力。这三个要件不可割裂：一笔未兑现的未来承诺只是一张空头支票，一套缺少承诺的兑现接口只是普通的资源分配，一条没有附加预支的债务锁链只是强迫劳动。只有当三者同时在同一个社会节点上运作时，才构成“身份预支”的完整装置。编制在当代

中国的特殊地位，恰恰在于它是这三大要件耦合得最紧密、运作得最公开、覆盖人口最广的那个结构节点。

本文的论证将通过五步推进。第一步，批判地检讨既有解释，抽出它们共有的先验预设——身份是可被“持有”的稳定实体——然后撤销它。第二步，在撤销先验之后，从矛盾中结算出“身份预支”这一新命名，给出精确定义，并通过不可还原校验——逐一击穿布迪厄的元资本、经济学贴现、卢曼的系统信任、福柯的规训与戈夫曼的总体机构、以及商业“可购买安全”方案，五个对手依次被检验。第三步，追踪一个贯穿全文的十年案例，在具体的生命史中展示编制的“兑现接口”——房贷审批、婚恋匹配、代际推力——如何在一个活人的时间表上被逐次激活。第四步，以同一案例为线索，分析身份预支的代价：不是展示“一个被掏空的结果”，而是展示“体质化剥夺”如何在每一次微小的、主动的、在当时看来完全合理的选择中，一层一层地结算出叙事语言的丧失。第五步，通过思想实验逐一关闭兑现接口，并以不同的关闭顺序测试三大接口的层级结构，展示编制失去预支能力之后将显露出什么质地。结论总结核心命题的理论增量，给出可被证伪的条件，并划定本框架的界限——包括通过国际比较阐明“终身雇佣≠身份预支”。

二、抽出一个先验，撤销它

在提出“身份预支”这一新命名之前，有必要先回到既有解释的内部，精确地指出它们“卡”在哪个地方——不是哪里说错了，而是哪里被它们集体默认为真，因而构成了一切后续分析的盲区。

（一）从“持有”到“预支”：一个先验的抽出

制度主义、理性选择理论与文化解释，共享着一套深层句法。制度主义说：编制“提供”了更好的福利——养老金、医保、公积金，这个人“有了”更好的保障。理性选择说：个体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做出了“持有”稳定职业的最优决策——他“选择了”低风险。文化解释说：科举传统让中国人“拥有”一种对体制内身份的向往——这种文化倾向深植在共同体成员的认知结构中。这三套说法的共同结构是：“主体—持有一对象”。编制是被持有的对象，保障、稳定、面子是持有物，个体是持有者。

这个结构之所以能顺畅运作，是因为它依赖一个深层假设：身份是某种可以被稳定地“拥有”的东西。一个人获得编制，就像一个人买了一栋房子——房子在这里，他在那里，他“有了”它。这个假设听上去理所当然，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确实这样谈论身份：“他是公务员”“她有北京户口”“我拿到offer了”。然而，这个语法恰恰遮蔽了身份最根本的发生学质地：身份不是持有的，是发生的——它不在任何一个静止的时间切片里完整地属于谁，它是被持续的、指向未来的社会互动一遍遍“兑现”出来的暂时结果。

更精确地说：一个身份之所以在今天看起来是“属于”某个人的，是因为有一系列社会制度在背后持续运转，把这个身份所指涉的未来可能性，一次次地“搬运”到当下，让它在上一轮的运作刚刚失效之前就被新一轮的搬运重新接上。一个程序员的身份，今天还是“某互联网公司高级工程师”，明天可能就不属于他了。为什么？不是因为他不努力，而是因为那个搬运未来确定性给当下的制度——这家公司的薪酬体系、组织架构、业务方向——本身就不承诺任何未来，因而它所搬运的“明天”永远是空的。反过来，一个在编的公务员，他的身份之所以几十年如一日地“属于”他，不是因

为他的工作表现比程序员更稳定，而是因为他背后那套搬运未来确定性的装置——国家编制系统——承诺了一个极长的、几乎覆盖整个劳动生涯的未来，并把这个承诺在每一天的制度化运作（工资到账、档案续存、职级晋升）中多次重复兑现。

因此，让我们撤销那个先验：身份不是被持有的，是被持续兑现的。不是“谁拥有了什么身份”，而是“什么样的制度装置，能把人的未来承诺提前兑现到哪个时间点、以什么样的频次和确定性”。一旦撤销了“持有”的先验，编制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被静态描述的“更好的身份”，而成为一个动态运作的“预支装置”——它的吸引力不在“它现在能给我什么”，而在“它能把我的未来提前多久、提前多确定地兑现给我”。

（二）一个理性选择理论可能提出的反驳——以及它的边界

这里需要正面处理一个足够有力的反驳。一个训练有素的理性选择理论家完全可以如此回应本文的撤销动作：你所说的“身份预支”，并不是对理性选择理论的否定，而是对它的一种更精微的描述。理性选择理论从来没有说过个体只能贴现“货币”——它完全可以把“未来确定性的提前兑现”纳入个体终生效用的预期最大化算式之中。一个人为什么甘愿接受编制相对较低的当期货币收入？恰恰是因为他在做一生跨期的效用计算：他知道编制的未来收入流虽然不高，但它几乎没有波动，而且这个“无波动”本身具有巨大的心理效用；他还知道，这份“无波动”可以通过婚姻市场转化为择偶优势，通过代际期望转化为父母的情绪稳定——这些都可以作为“未来收益”被折现到他当下的决策之中。换句话说，理性选择理论完全可以承认“身份预支”的存在，只是把它解释为一种在特定制度约束条件下的理性贴现行为——你的“预支”概念，不过是给理性预期模型换了一个文学化的名字。

这个反驳是有力的，因为它不是在否认现象，而是在吞并现象。它说：你看到的，我早就看到了；你只是把我已经看到的，用一种更戏剧化的语言又说了一遍。因此，本文必须精确地指出理性选择理论“吞并不了”的那条缝在哪里。

这条缝在于：理性选择理论能够处理“贴现”，但不能处理“贴现的贴现率本身是被预支结构设定的”。更具体地说——当一个人把编制的“未来确定性”作为一种收益来贴现时，他必须先有一个偏好排序：什么算“好生活”？什么算“风险”？什么算“值得追求的不确定性”？理性选择理论默认这个偏好排序是外生给定的——个体的偏好是先于选择而存在的，选择只是在这些既有的偏好之间做最优配置。但编制的身份预支装置所做的，恰恰不是在既有的偏好排序里被“选中”，而是重新奠基那个偏好排序本身。一个人在进入编制之前和进入编制之后，他对“什么叫好生活”的判断，已经不是同一个判断了——不是因为他的理性计算改变了某些参数的权重，而是因为计算所使用的那个“价值坐标系”被替换了。一个在体制内工作了十年的人，当他看到市场上有人年入百万但随时可能失业时，他不再是“理性地偏好稳定”——他是从一套已经内化完成的、名为“编制人生”的元框架出发，将市场生活的波动性感知为“不可理喻”的。他不再是在做偏好的排序——他是在用一种已经被预支结构给出的排序规则，来“认出”世界中的选项。

理性选择理论可以解释“我为什么选A而不选B”。它不能解释“我为什么开始认为A类选项才是选项，B类选项根本不在菜单上”。而身份预支的发生学核心，恰恰不在“选”的那一下，而在“菜单被重写”的那个不为人知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本文在第四、第五节中将要逐层展示的——不是在

一个人做决策的时刻，而是在他此后十年里每一次微小的、主动的、在当时看来完全合理的日常选择中，被一层一层结算出来的。

三、身份预支：一个不可还原的命名

在撤销了“持有”的先验、并将问题从句法层面转换为“未来如何被提前兑现”之后，新的概念不是被“想出来的”，而是被矛盾“逼出来的”。本节的任务，就是把那个从矛盾中逼出来的概念清晰地命名、定义、并通过不可还原的校验。按照发生学叙述的逻辑，本节将先不端出精确定义，而是让读者亲眼看着：旧概念是怎么一块一块砸碎的，那个空心地带是怎么露出来的——然后再说，“这个地带，我把它命名为身份预支”。

（一）从矛盾里结算出来

让我们回到编制现象最根本的那个张力。编制给一个人的安全感——那种“不管外面怎么变，我这辈子不会被甩下”的确定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昂贵、最稀缺、被最多人渴望的心理通货。但是，这种确定感的来源，恰恰是它所否认的东西：未来。编制之所以能“确定”，不是因为它背后那个叫“国家”的担保人掌握了未来——它也没有——而是因为它用当下可感的安全感，交换掉了持有者质疑未来确定性的能力。一个人进入编制的那一刻，他获得了一份关于未来的笃定，但他为此支付的，是把“未来可能还有别的活法”这条神经一根根掐断的代价。

这份笃定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需要被持续地生产、被制度性地维护、被社会性地承认。生产它的原材料，正是一个人尚未发生、未被决定的“余生”。一个二十七岁考上公务员的年轻人，他放弃的是什么？不是这份月薪和那份月薪之间的差额，而是他此后三十五年的余生——那些原本可能在不同城市、不同行业、不同人际关系中被缓慢展开的各种各样的人生可能性——被提前集中处理了。编制不是给他分配了一份工作。编制是对他开出了一张面额为“今后三十五年确定安全”的银行本票，然后用这张本票，在他二十七岁的当下，就替他完成了本应在此后三十五年中逐一面临并逐一做出选择的所有重大社会事务——购房资格、婚恋权重、社会地位、父母交代、自我确认。他不是不用再选择了，而是他已经预先选过了，今后的三十五年只是照着那张本票上的条款一条一条签字确认。

这，才是编制的全部秘密。编制不是一个身份，是一张由制度签发、社会承认、个体承兑的对未来的本票。

（二）砸碎旧概念：不可还原校验

本文把这个现象命名为“身份预支”。但在这个命名被接受之前，必须先用最严苛的检验通一遍：有没有一个既有学科里的既有概念，能在一句话之内完整地替换“身份预支”而意思保持不变？如果有，这个命名就是失败的——它只是用新词重述旧知。如果没有，它才立得住。以下是逐一校验。

第一个校验对象：布迪厄的“国家元资本”。布迪厄在《实践理性》中提出，国家是“元资本的持有者”——它拥有为其他资本形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设定兑换率的终极权力。编制确实是一种被国家盖章的身份资本，它的兑换率高，是因为国家这个“元资本持有者”在背后为它背书。布迪厄可以准确地解释：为什么编制身份在各种社会场域中都能被高估——因为国家这个终极

权威把自己的符号重量压在了它上面。但他不能解释的是“时机”。元资本理论告诉你，国家给这张身份盖的章含金量很高。但它没有告诉你，为什么这张章可以在一个人二十七岁的时候，就把他三十五岁以后的房贷资格提前兑现了。元资本管的是“兑换率”——多少身份换多少社会尊重；但预支管的不是兑换率，而是“兑换的时间悖论”——未来的东西凭什么现在就能用？布迪厄的理论里没有时间维度。它是一套关于静态结构的理论——场域、资本、惯习，都是在一个给定的时间切片里运作的。你可以用它解释“编制在婚恋市场上为什么会溢价”，但你不能用它解释“编制的溢价为什么是提前发生的”——为什么一个还没结婚、还没买房、还没生子的二十七岁年轻人，仅仅因为他“考上了”，就立刻获得了一笔本应在他此后三十年中逐次兑现的身份通货？布迪厄够不到“提前”这个动作。第一个旧概念，砸碎。

第二个校验对象：经济学中的“未来收入贴现”。这是最危险的手，因为它天然具有“把未来折现到当下”的语义。房贷审批就是典型的贴现操作：银行把你未来三十年的预期收入流折现，算出一个你当前能承受的贷款额度。经济学完全可以承认编制的吸引力有一部分来自这种贴现——编制的未来收入虽然不高，但它的确定性极高，所以它的贴现值反而可能高于一份当期收入更高但波动更大的市场职业。但它够不到两个更深的东西。第一，婚恋市场上被预支的，不是未来的收入，而是未来身份的“可共享性”——你和一个有编制的人结婚，你不是在贴现他未来的工资单，你是在预支“体制内家属”这个社会身份在未来若干年里的持续有效性。这份有效性的价值，不是用货币计价的——它是用“你不会被这个社会忽然甩掉”的确定性计价的。经济学没有把它纳入贴现算式的单位。第二，代际期望里被预支的，更不是子女未来的现金流——是父母自己几十年前在下岗潮中被打碎的那份“世界是安全的”基本信任。这份信任的修复，无法被任何贴现率折算。你用一个经济学模型去问一位在1998年下岗后摆了十年地摊的母亲：“您对女儿考编的期望，可以折算为女儿未来预期收入的百分之多少？”这个问题本身是对她恐惧的羞辱——她要的不是钱，是死前能看到女儿被一堵不倒的墙挡住。这堵墙不是“收入流”，是一个在经济学算式的括号外面、永远不被计量的东西。第二个旧概念，砸碎。

第三个校验对象：卢曼的“系统信任”。这是本文必须正面遭遇的一个对手，因为它捕捉到了身份预支运作机制中一个最隐蔽的面额——“免检”——并且比本文更早地完成了对此特征的理论化。卢曼在《信任》与《权力》中提出一个核心区分：人格信任（对具体的人的信任）与系统信任（对抽象的社会系统运作机制的信任）。货币、法律、科学、官僚制，都是系统信任的载体——你信任一张钞票，不是在检验这张纸的真伪，而是在相信“印这张钞票的系统整体上不会崩溃”。一个卢曼主义者读到本文第三节，完全可以在吞并意义上做出如下回应：你说的“身份预支”，就是官僚系统的系统信任在编制身份上的一个亚型表现。银行放贷给陈旭，不是在为他个人的未来做时间贴现，而是在调用它对“国家编制系统整体上不会垮”这个系统信任的预存额度。婚恋市场上那个不假思索的“稳当”判断，代际期望里那份看一眼编制就觉得安心的情感，本质上都是系统信任在代际间和阶层间的自动分发。你认为“免检”是预支装置最独特的面额——但“免检”本身就是系统信任的核心特征：系统信任的操作定义，恰恰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检验、也无法逐一检验。

这个吞并动作比经济学贴现更难击穿，因为它捕捉到的恰恰是“免检”这一本文自认为最锋利的局部发现。必须承认：系统信任理论确实为编制的“免检”特征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结构性解释。但本文要指出的是，系统信任有一个它自己够不到的盲区——它告诉你，在当下的这一时刻，人们信任某个制度系统，不需要逐次检验它的每一次操作。但系统信任理论从不追问一个关键问题：信任的时间

矢量。你当下信任一个当下运作着的货币系统——你相信你手里这张钞票今天能花出去。但你有没有可能在当下，提前支取一笔迄今为止尚未发生的、属于未来时间的信任？货币系统不允许你做这件事——你不可能今天走进一家银行，用你三十年后才会挣到的一笔工资作为抵押，今天就把那笔钱贷出来。为什么？因为货币系统的信任是即时的——它只信任当下已存在的价值，不对尚未发生的未来时间做预支。但编制恰恰在做这件事：它让一个人在二十七岁那年，就把此后三十五年的“不会被甩掉”的确定性，提前全部提取出来，在当下的房贷审批、婚恋市场、代际期望中使用。这笔被提前提取的信任，其面额不是“当下这个制度的有效性”，而是“你今后三十五年的人生”——而今后这三十五年，是尚未发生、不可逆、充满变量的未来时间。

因此，本文与卢曼的分界线在此划清：系统信任是对当下制度的“免检”信任——人们在当下信任货币、法律、官僚制这些抽象系统，不需要每次检验它们。编制的“免检”，则是对未来时间本身的“免检”——一个人不需要等待未来的逐次验证，就能够在当下提取“这辈子不会出大事”的全部确定性。前者是结构性的，后者是时间性的。卢曼的理论里没有这个时间维度：它无法区分“我信任当下的编制系统”和“我预支了未来三十五年被编制系统承接的确定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动作。前者的信任对象是一个现存制度的稳定运作；后者的信任对象是一个尚未发生的、属于我自己的余生。这把区分，是系统信任理论内部推导不出来的——因为它的理论架构只问“信任什么”，不问“从哪个时间点上信任”。正是“跨出当下、提前兑现未来时间”这个动作，构成了身份预支特有的、不可被系统信任概念所覆盖的独立维度。第三个旧概念，击穿。

第四个校验对象：福柯的“规训”与戈夫曼的“总体机构”。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校验，因为它们共同瞄准了预支装置在个体身上的运作方式。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描绘的那种现代权力——通过持续的监视、考核与规范化操作，把个体塑造为可管理的主体——用来描述编制内部那套“不出事就能续期”的操作逻辑，几乎是天造地设。戈夫曼在《收容所》中剖析的“总体机构”——一种将个体的日常生活、工作、休闲与身份全部纳入同一套封闭系统管理的装置——用来描述体制内“从生到死全包”的制度特征，同样精准。

但这里必须诚实面对一个被本文此前版本忽略的关键问题：当作者在初稿中反驳福柯和戈夫曼时，使用的理由是“他们完全解释不了——他为什么在规训开始之前，就已经花了三年时间、拒绝了其他所有工作、倾全家之力——拼命想进去？他为什么是跑步签收押同意书的？”一个熟悉规训理论传统的审稿人会立刻指出：这个反驳本身是不成立的。因为规训理论发展到成熟阶段，恰恰就包含了“主动奔赴”的机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后半部分讲得很清楚：纪律权力一旦完成内化，就不再需要外部强制；个体将规范内化为自我价值实现的标准之后，会自发地追求被规范化、主动向规范化机构靠拢。军队的荣誉制度、精英学校的入学竞争、修道院的志愿入院，都是个体“争着进去被规训”的典型场景。规训理论完全可以用“规范内化”来解释为什么一个人会花三年时间拼命考编——因为在他的认知框架里，“被规范化”已经不是外在强迫，而是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唯一可想象路径。因此，用“主动奔赴”作为反驳规训理论的依据，从一开始就站在了规训理论已经覆盖了的表面上。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身份预支”就可以被归入规训的范畴。真正的划界依据，不在“进入之前”的动机，而在“进入之后”的维持机制。规训的权力，需要持续的监视与考核来不断生产规范主体。福柯的圆形监狱里，瞭望塔必须一直亮着——哪怕没有人真的在看，被囚者必须相信有人在看。机构必须布置检查、考试、评级、档案记录，这些不间断的规范化操作，才是规训权力再生产自身的

物质基础。戈夫曼的总体机构更是如此——它必须把个体的全部生活封闭在一套完整的管理系统之内，严格限制个体与外界的接触，才能维持对个体身份的全控。

但身份预支启动的“体质化剥夺”，在个体进入编制之后，不需要持续的监视与考核。它只需要个体在每次面临选择时，自己替他过去曾做出的那次“考编”决策守住不亏。银行不问他工作表现——只问他在不在编。婚恋市场不问他年终考核排第几——只问他是不是体制内。他父亲不问他有没有在单位里提方案——只问他还在不在岸上。这三个接口，没有一个是靠监视他的日常工作来维持的。它们靠的是一张他考入那天一次性签发的“未来支票”，在此后十年里，经由房贷月供、妻子期待、父亲安心这三个独立的社会接口连续自动兑现——每一次兑现，都让他“不亏”的动机被再次确认，让他质疑这张支票的欲望被再次悬置。他不是被瞭望塔里的狱卒管住的。他是被自己那张已兑现支票的三个收款人——银行、妻子、父亲——同时看住的。而他看守自己的方式，不是服从监视，而是一次次在面临“安全vs可能”的岔路口时，轻声告诉自己：“走不起。”

这才是规训够不到的那个地方——不是“主动奔赴”，而是奔赴之后的后果不需要被监视。编制不需要任何人来监视陈旭的工作。它只需要在他每次想辞职做环保数据平台时、每次想提流程优化方案时、每次凌晨三点睡不着想重新定义“我这十年”时——让那份已兑现支票的平仓恐惧，在他自己的脑袋里替他拉住闸门。规训靠持续的监视和规范化操作持续生产主体；预支靠一次性签发的未来支票在三个社会接口上的连续自动兑现，让个体自己替系统持续看守自己。这条边界——维持机制从“外部监视”变为“自我看守”、权力运作从“持续性”变为“一次性签发、自动续期”——是福柯和戈夫曼从未命名、也无法从其理论内部推导出来的独立维度。第四个旧概念，砸碎——但这一次，是站在承认规训理论对“主动奔赴”已有解释力的基础之上，在更精确的地方划清了界线。

第五个校验对象：商业“可购买的安全”。还有一种更当代的、更逼近“预支”的挑战，不是来自某个经典理论家，而是来自市场本身的创新。近年来，高端商业健康保险、覆盖配偶及子女的家族信托、行业公会提供的跨雇主福利接续机制——这些商业方案正在尝试把“未来的确定性”做成一个可购买的商品。一个年收入可观的程序员，在二十多岁开始配置这些方案，有可能在三十五岁之前构建出一套在保障水平上足以媲美编制的安全网。如果他能做到，编制的独特性还能成立吗？

它能成立——但恰恰因为商业方案暴露了编制那层最隐蔽的面额。一个程序员即使买全了所有商业保障，他在婚恋市场上向对方父母解释自己“安全”的时候，仍然需要拿出一叠保单、做一次说明、甚至需要对方有足够的金融知识来理解这些保单意味着什么。他的安全需要被“检验”——被理解、被相信、被承认。而编制的安全不需要被检验。它在被看见的那一瞬间，就已经被社会默契自动识别为“可靠的”。它的确定性不需要论证——它是一种“免检”的确定性。这个“免检”，才是编制那张未来本票上最深的水印。市面上的一切商业方案都无法复制它，因为“免检”不是一种可以被任何精算模型定价的商品——它是一种被国家这个终极背书者所垄断的“社会信任豁免权”。而且，正如上文在卢曼校验中已经论证的，这份“免检”豁免的不只是当下制度的有效性，更是今后的时间本身——商业方案永远无法替一个人预支他尚未发生的三十年人生，因为没有任何商业公司的信用可以跨出当下、担保一个尚未到来的未来。这才是编制无法被任何商业替代方案复制的最后一道护城河。第五个挑战，击穿。

至此，“身份预支”通过了不可还原校验。它不是布迪厄的元资本加了一点时间维度，不是经济学的贴现加了一点情感，不是卢曼的系统信任在编制身份上的一个亚型表现，不是福柯的规训加了一

点主动奔赴——它是所有这些既有概念在“编制现象”这个特定压力场中碰撞之后，被逼出来的那条不属于任何一个旧概念的新的辨别缝。这条缝，就是“身份预支”所站的地方。

（三）精确定义

校验完成之后，现在可以给出精确定义。身份预支作为一个发生学概念，其精确定义如下：

身份预支：一套社会制度装置，它以“未来确定性”为面额、以国家信用为背书、以多重社会接口为兑现通路，在当下为个体提前兑换出一套已完成的、可流通的身份；个体接收这笔预支的同时，将尚未发生的余生时间作为无形质押物交存于该装置，从而在获得确定的同时丧失了对这套身份价值进行再质疑的权利。

此概念的三个构成要件在此重述：第一，一个“未来承诺”——国家编制系统所担保的终身雇用、福利存续和身份稳定性；第二，一套“兑现接口”——房贷审批、婚恋匹配、代际期望等一系列让未来承诺在当下被识别、被估价、被兑换为现实利益的社会制度；第三，一条“债务锁链”——同步产生的“不得质疑”的心理约束和“不能退出”的社会约束，使得接收预支的主体在获得确定的同时，丧失了重新定义自身价值的能力。三者同时耦合，才构成完整的“身份预支”装置。

四、预支的接口：一个十年案例中的兑现链

概念确立之后，需要进入更具体的机制分析：编制的未来承诺，是通过哪些社会制度接口被提前“兑现”的？这些接口如何运作？更重要的是，这些接口不是理论上的“变量”，而是在一个人的真实生命史中，有年份、有地点、有具体对话和具体失眠夜晚的、彼此勾连的事件。本节将以一个追踪十年的深度案例为线索，展示三大兑现接口如何在同一个人身上逐次激活，编织出一张完整的预支网络。但在展开案例叙述之前，必须首先诚实交代其田野基础与叙事边界——这份透明本身，是论证可信度的一部分。

（一）案例的田野基础与叙事边界

本文所使用的陈旭案例，其事实性基础来自作者于2014年至2024年间对若干体制内就业者进行的长期非结构性跟踪访谈与参与观察。所有人物均已做匿名化处理，姓名、具体单位名称、城市信息均已替换。案例在以下三个层面上经过典型化处理：第一，将分散在不同受访者身上的结构性特征合并在一个叙事性人物身上，以集中展示“身份预支”三大接口的系统性耦合——这是定性研究中广泛使用的“复合案例”方法；第二，部分生活场景（包括本文中出现的家庭对话、内心独白式的心理描写）系基于受访者在多次访谈中反复报告的情绪模式与典型反应方式的文学化重构——这些描写的目标不是忠实复现某一个具体的言语事件，而是呈现某种反复出现、可被模式识别的内在体验结构；第三，关键时间节点（入职、购房、结婚）的事实信息来自受访者自述，并经交叉验证——作者在可能的情况下核对过购房年限、婚姻登记时间等客观信息。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两个被本文反复回扣作为论证锚点的场景。其一，陈旭父亲在入职当晚表示高兴这件事——来自陈旭原型受访者在2019年访谈中对入职当晚家庭氛围的回忆；原访谈中，受访者仅提及“我爸那天挺高兴的，好像觉得以后不用再操心了”，具体倒酒的动作与台词系作者经典型化处理后提炼。其二，2024年春天凌晨失眠的心理描写——来自同一受访者在2023年底一次深度访谈中

对“我这十年不知道做了什么”这一内在状态的反复自述（在不同的三次访谈中均以相似的措辞出现）；那段以“无法被反驳的、均匀的、弥漫的空白”为喻体的心理叙事，系作者对该自述模式的展开性重构，旨在将受访者以断续语言表达出的弥散体验，转化为连贯的可理解叙事。

坦白这些叙事操作，不是为了自辩——恰恰是为了标明一条边界：本文案例属于“思想拓展型例示”而非“严格实证意义上的个案报告”。它的论证功能是展示“身份预支”的概念如何被操作化地追踪为一条生命史线索，而不是提供统计意义上的证据或因果推断。如果读者将本文的案例声称误读为严格实证性的证据展示，那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失败；作者在此明确放弃这种声称。案例让读者看到“预支可能如何在一个人身上发生”的全程——至于它“在多大比例的人身上以这样的方式发生”，是后续经验研究的工作，不在本文的论证范围内。

（二）案例引入

陈旭（化名），1989年生于安徽一座三线城市。父亲是原国有化肥厂的技术员，1997年工厂改制下岗，此后辗转做过保安、快递分拣、工地库管，家庭经济状况长期拮据。母亲在社区街道办做临时工，没有编制，月收入从未超过两千元。陈旭2011年从本省一所普通本科院校毕业后，在合肥一家私营教育培训机构做课程销售，月薪底薪加提成约四千到六千元，没有五险一金。2013年春天，他辞职回家，全职备考。2014年，他以笔试第三、面试第二的成绩考入本市某区环保局，事业编制，入职时二十五岁。此后的十年，是他被“身份预支”这台装置逐层兑现的十年。本文追踪的，是他2014年入职到2024年这十年间，在四个关键节点上发生的事情。

（三）第一次兑现：房贷审批（2016年）

陈旭入职两年后，也就是2016年初，开始考虑买房。他的月薪是三千八百元，加上各类补贴和年终绩效，年收入约六万元。他的大学同学周宇，同一年毕业，没有考编，留在合肥做程序员，此时在一家互联网创业公司，月薪一万两千元。两个人差不多同时动了买房的念头，结果却完全不同。

周宇去银行咨询贷款时，被告知因为所在公司规模小、经营年限短、行业波动大，他的收入虽高但不能作为稳定还款来源认定，银行要求他提供更高比例的首付，或者找有固定工作的直系亲属做共同还款人。周宇父母都是下岗工人，无法满足条件。他最终放弃了在合肥市区买房的计划，转而考虑偏远郊区的二手房。陈旭去同一家银行，提供了单位开具的在职证明和近六个月的工资流水。银行客户经理看完材料后，给了他一笔三十年期的组合贷款，利率在当时基准上打了九五折。他的月供是两千一百元，占月收入的一半以上。银行没有要求他提供共同还款人，没有问他父母是否有退休金，没有质疑他三千八的月薪如何撑起三十年贷款。客户经理只说了一句：“事业单位，稳的。”

场景分析：被激活的预支机制。这不是银行“偏爱”公务员。这是银行在做一件逻辑上极其反常识、却在日常操作中被彻底自然化了的事情：它用一个人“未来三十年不会断供”这一尚未发生的事实，作为当下放贷的依据。周宇的一万二月薪是受行业景气、技术迭代、公司经营、个人年龄等多重变量影响的高频波动指标——今年一万二，明年公司倒闭就可能归零。这些东西，银行的风控模型比周宇本人算得更清楚。而陈旭的三千八，被这套模型识别为某种“永续年金”——他背后的担保人不会倒闭、不会裁员、不会因为经济周期而下调工资。银行给陈旭更低利率，不是在对他的“当下”估值，而是在对他“今后三十年”的稳定性做一次性预支。他还没拿到今后三十年的工资，但银行已经把三十年的稳定未来提前批给了他——以一笔三十年期的低息贷款的形式。

日志级后果：下一步前提的设定。就在陈旭签下贷款合同的那个下午，他第一次感受到了编制那张未来支票的真实重量。那不是个抽象的制度优势——那是他可以用手摸到的、写着他名字的、每月还款利率比周宇低了将近一个百分点的具体数字。他在当天晚上给父亲打电话时，没有说“我贷款批下来了”，说的是“银行的利率比外面低”。这个措辞本身说明，他已经开始把编制的制度优势内化为自己的财务收益——不是在“使用”一个制度，而是在“享受”一笔属于自己的折扣。这次兑现，为他此后所有的选择下了一个不容易被察觉的锚：编制不是一份工作，是一个可以反复去银行柜台前提取优惠的存折。今后任何一次想辞职的冲动，都将首先触发一个自动反问：辞了，房贷怎么办？这个反问不需要任何人来问他——他自己会在脑子里问自己。而这个问题一旦被问出来，答案就已经在问题里了。

（四）第二次兑现：婚恋市场（2018年）

陈旭2017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后来的妻子赵琳。赵琳比他小两岁，同一城市人，在一家私营广告公司做平面设计，月薪五千元，没有编制。两人相处半年后决定结婚。在两家父母第一次正式见面的饭桌上，赵琳的父亲——一个同样经历过下岗、后来开了一家小五金店维持生计的中年男人——说了这样一番话：“小陈这孩子在职场内，稳当。我们不是图什么荣华富贵，就是图个安心。琳琳跟着他，以后日子苦不了。”

场景分析：被激活的预支机制。这番话里，“体制内”和“稳当”是连在一起说的，而且被当成“日子苦不了”的充分条件。注意这里发生的逻辑跳跃：“你在体制内”是一个关于陈旭个人职业状况的事实陈述；“琳琳以后日子苦不了”是一个关于赵琳未来几十年生活质量的预测。这两者之间的因果链中间，站着无数未被言明的担保：你不会被裁员、你的工资会逐年递增、你的医保会一直有效、你的退休金会比市场平均水平高、你不会因为三十五岁中年危机而被一脚踹出门外。所有这些担保，被压缩进“体制内”三个字里，然后被赵琳的父亲在饭桌上一次性提取为他对女儿未来生活的全部放心。编制那张本票上本来就印着一行社会默契里的小字——“持票人可携带一名直系亲属上车”。赵琳通过婚姻，获得了一份她原本没有的、对未来的集体免疫：她不再是“私营广告公司里那个随时可能被裁掉的设计师”，她是“某区环保局公务员的妻子”。这个后缀，在她的社保断缴时，是备份；在她的父母生病时，是人脉；在她被问及“你是做什么的”时，是一个比“做设计的”更容易被点头认可的社会身份。

日志级后果：下一步前提的设定。婚后第二年，赵琳的父亲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当着陈旭的面，对一位亲戚说：“我们家琳琳命好，找了个有编制的。不像我，一辈子提心吊胆。”这里“提心吊胆”是这位父亲对自己从下岗到开五金店这二十年的全部经历的压缩。而他用来解除这份恐惧的，不是任何实际的经济指标，而是“有编制的”这四个字。这份恐惧的解除，就是编制在代际期望接口上最核心的兑现——它平掉了一份已经延期了几十年的恐惧账单。而陈旭，在那个饭桌上，没有说任何话。他只是点了点头，笑了一下，继续吃饭。

这个沉默是一个比任何言语都更重的事件。它在陈旭的心理结构里刻下了一条潜规则：“你的身份不完全是你的——它还是你岳父用来平仓他那二十年恐惧的抵押物。你一辞职，他那一二十年的提心吊胆就重新解锁了。”这条规则不会被任何人明确说出来——岳父永远不会走到陈旭面前说“你不能辞”。但这条规则在陈旭此后每一次冒出“也许我可以试试别的”时，都会被自动触发为一个阻止信号——不是“你不能”，而是“你忍心吗”。后者比前者更不可违抗，因为它的惩罚不

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他自己对一个老人的愧疚想象。这一次兑现，为他的下一步选择锁死了一条逃生通道——不是辞职变得不可能，而是辞职被赋予了“背弃一个两次受伤的人的最后信任”的道德重量。这份重量，是他自己在那天饭桌的沉默里，亲手给加上去的。

（五）第三次兑现：代际期望（2014年已发生，持续兑现中）

实际上，代际期望接口的兑现，从陈旭考编成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早于房贷审批，早于婚恋匹配。2014年夏天，陈旭收到入职通知的那天，是他父亲下岗十七年以来，第一次在晚饭时主动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他父亲话不多，只说了一句：“好。以后不用我操心了。”

场景分析：被激活的预支机制。这句话里的“以后”，不是指陈旭此后几年的生活，而是指从这一天起，一直到他自己闭眼之后陈旭仍然不会坠落的整个余生。他的操心挂了十七年，在那杯酒里被一次性平仓。下岗潮留下的创伤不是失业本身——是“世界随时可能把我甩掉”的底层恐惧。这份恐惧在他失业后的十七年里没有治愈过一天，因为他此后再也没有获得过任何一份能给他“不会再被甩”的确定性的工作。当他看到儿子拿到了那个他自己一辈子都没拿到的东西时，他十七年前被砸碎的那块地基，终于被接上了。他不是为儿子的工资高兴——他是为自己的恐惧终于被平账了而轻松。这杯酒，是他用十七年的失眠预付过的，现在儿子替他兑了现。

日志级后果：下一步前提的设定。这顿饭之后，陈旭再也没有主动向父亲提起过“也许我以后可以试试别的”这种话。不是因为他不想提——是因为那句话已经被他父亲那杯酒盖了章。他不能再撤回一份已经被平仓的恐惧。撤回意味着让那杯酒变成笑话，让父亲重新回到十七年的失眠里。这个代价太沉重了，沉重到陈旭在此后的十年中，每一次在内心浮出“辞职”这个念头时，第一个拦住他的，不是房贷，不是妻子，是他父亲2014年夏天那杯酒。那杯酒，是他预支的那笔身份里，利息最高的一笔。

五、预支的代价：体质化剥夺的发生过程

前一节展示了三大接口如何在陈旭的生命史中逐次激活，将他未来三十年的确定性提前兑现为房贷、婚姻和父母的安心。本节将以同一案例的后半段为线索，展示预支的反面：不是“他被掏空了”，而是“他每一次主动的、在当时看来完全合理的选择，如何下一次接下一次地，把他‘自我重新定义’的可能性逐步撤掉”。本节将使用“体质化剥夺”这一概念来描述这个过程——它不是一种被动承受的损失，而是在主动参与中被一层一层结算出来的结果。

（一）体质化剥夺：一个替换性定义

“体质化剥夺”与“规训”的边界已在第三节的福柯校验中被完整划清，此处仅重申其区别的核心：规训的权力依赖持续的监视、考核与规范化操作来生产主体——瞭望塔必须一直亮着。体质化剥夺则不需要外部监视。它只需要个体在每次面临选择时，自己替他过去曾做出的那次“考编”决策守住不亏——那张一次性签发的未来支票，经由房贷月供、妻子期待、父亲安心三道接口连续自动兑现，让个体自己替系统持续看守自己。它不是从外部禁止个体的选择，而是每一次选择“安全”的当下，都主动参与了把“不安全的选项”移出菜单的操作。如此迭代十年之后，菜单上只剩下一个选项

——不是因为他被关起来了，而是因为他已经把其他选项所需要的那个“自己”，在过去十年无数次微小的、合理的选择中，一层一层地质押掉了。

体质化剥夺的发生学特征有三：第一，它是主动的——每一次选择都是个体在当下情境中做出的理性判断，没有任何外部力量强迫他；第二，它是累积的——单看每一次选择，都是微小到不值一提的日常判断，但它们在时间轴上连起来，结算出的是一个不可逆的结果；第三，它是无声的——个体在被剥夺的过程中，通常感受不到任何痛苦，因为他从来没有被禁止做任何事。他只是每一次都“恰好”选了那条最安全的路，而那条路恰好是系统已经提前铺好的。体质化剥夺不描述一个已被掏空的终极状态，而描述一个尚未停止的、每次选择都进一步缩窄菜单的进行时过程。

（二）体质化剥夺的四年：陈旭的叙事语言报废（一个追踪纪录）

在陈旭的生命史上，2014年入职到2020年这六年间，他完成了预支的兑现——房子、婚姻、父母的安心。这段时间里，身份预支对他来说是一笔正向资产：他每一次感受到那张未来支票的有效性，都在加固他对“我当初选对了”的确认。但2020年之后，质押的方向开始逆转——不是预支装置失效了，而是它开始向陈旭收取本息。

以下是三个分别发生在2020年、2022年、2024年的片段。它们不是“他有天忽然觉得自己被掏空了”的证据——它们是他体质化剥夺链条上的三个结算点，每个点都在前一个点的基础上，把“重新定义自我”的可能性撤掉了一层。为严格遵守上文承诺的叙事边界，每个片段将分为“事件叙述”与“机制分析”两层分别展开——前者交代发生了什么，后者追踪这一步如何在上一步的基础上为其下一步设置了新前提。

2020年夏天·第一次结算：吞回去的辞职念头。

事件叙述。 陈旭的大学好友周宇，就是2016年和他一起贷款买房的那个程序员，在2020年跳槽到了一家新公司，年薪涨到了四十万。周宇在微信上和他说，新公司在做一个环保监测数据平台，想找一个懂环保政策的人做顾问。他半开玩笑地问陈旭：“你要不要辞职出来一起干？”陈旭没有直接回答。他放下手机，想了一个下午。在那一个下午里，他脑子里依次出现了三件事：第一，每个月的房贷，两千一百元——不辞职，这笔钱从他工资卡上自动划走，他几乎感觉不到；辞职，这笔钱就是悬在他头上的一根绳子，每个月都要他亲手去解。第二，他岳父2018年饭桌上那句“小陈这孩子稳当”——如果他辞了职，他就不再是“稳当”的了，他的婚姻不会因此破裂，但他再也不能在岳父面前理所当然地接受那份不言自明的信任。第三，他父亲2014年那杯酒——那杯酒是他父亲下岗十七年后第一杯主动倒给自己的酒。他如果辞了职，那杯酒就等于白喝了。这三件事没有一件在“禁止”他辞职。它们只是同时在他脑子里亮了三盏灯，每一盏都照在同一个路标上：“你走不起。”陈旭在那个下午结束之前，给周宇回了一条微信：“算了，我这性格不适合创业。”

机制分析：从“不能”到“不适合”的翻译装置首次启动。 此刻发生的关键动作，不是陈旭拒绝了周宇——而是他对自己的拒绝给出了一种特定的解释方式。“算了，我这性格不适合创业”——这句话里，“我不能”被翻译成了“我不适合”。这个翻译机制，是他体质化剥夺第一层的精确刻度。他在这一个下午的权衡中，同时被三笔已兑现的未来支票的平仓恐惧压住：房贷是用编制身份的低息贷来的——辞职等于那张支票的背书掉了，月供从“自动扣除”变成“悬在头上的绳子”；岳父的信任是在编制身份这个前提上盖章的——辞职等于把他送出去的那份“女儿的终身安心”收回；父亲那

杯酒是用编制的确定性酿的——辞职等于告诉一个下岗十七年的老人：你唯一一次不用操心的那杯酒，白倒了。这三笔恐惧没有一项是“外部禁止”。它们只是让他在脑子里自动预演了一遍“辞职后三笔账同时平不了”的场景，然后把这个场景的阴影，压缩进了“我这性格不适合”这六个字里。

这个翻译动作的后果是结构性的：下一次再遇到类似的可能性的邀请，他不会重新从头评估——他会直接调用“我那性格不适合这种事”这个已经在本次结算中被固定下来的自我认知。这个自我认知一旦形成，就不需要每次重新激活原始恐惧——它自己就变成了一个便携式的、“自动生效”的否决器。“我不适合”不是一个判断，是一个被内化了的的外部约束的代理——它以性格的语法说话，以恐惧做本金。

2022年冬天·第二次结算：说不出口的方案。

事件叙述。 陈旭在单位里工作了八年之后，对一个反复出现的低效流程产生了强烈的改进冲动。他花了两个周末的时间，自己在家写了一份详细的流程优化方案——新的审批节点、更短的文件流转路径、更合理的责任分工。他把方案打印出来，夹在工作笔记本里，准备在周一的例会上提出来。周一早上，他在会议室外面站了一会儿。然后他走进去，坐下，把笔记本摊开，没有翻到夹着方案的那一页。整个会议他都在听，没有发言。散会之后他把方案从笔记本里抽出来，折叠，放进了自己办公桌最下面那个抽屉。

机制分析：“不出事”的续期逻辑如何借上一次结算的痕迹自动生效。 这一次选择的机制，是上一次结算的直接延续。2020年那次，陈旭在自己的性格判断里固化了一个否决器：“我不适合做那种事。”两年后，当他面对“要不要提方案”这个选择时，这个否决器没有被直接调用——因为有人在邀请他创业。但它为另一个更细微的否决逻辑铺平了道路。编制内部那套“不出事就能续期”的操作逻辑，其核心规则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没出什么事”。一个被标记为“不太安分的”人，没有出什么事——但这道标记本身，已经是一个隐性事故。这份方案的递交，可能在最好的情况下被采纳，但在最可能的情况下——也是他在会议室外面预演了无数次的情况下——会被同事在心里标注为“这人想出头”。而他上一次已经固化了一个自我判断：“我的性格不适合冒险”。如果这一次他提了方案，就等于否证了自己两年前那个已经付款的判断——而那份判断是他两年前用一整个下午的权衡买下来的，否证它比不提方案的心理成本更高。他不是“怕同事”——他是在保护自己那套已经花了两笔大额心理支出才建成的“我是一个安全的人”的身份叙事，不被一份自己亲手写的方案推翻。

他在会议室外面站的那一分钟，不是犹豫——是让他两年前写下的“我不适合”在这一次出声。那句话一出声，方案就被提前宣布无效。散会后他把它放进抽屉最底层——那个动作不是“放弃”，是把一个可能的自己封存在一个永远不会再被打开的文件格里。这是体质化剥夺的第二层：不是系统从外面禁止了他提方案的权力，而是他上一次选择的那个“不适合”的自我判断，在这一次自动充当了否决器——他甚至不需要重新说服自己，否决就已经完成了。

2024年春天·第三次结算：叙事语言的报废。

事件叙述。 入职十年后的一个夜晚，陈旭辅导完孩子的作业，妻子和孩子都睡了。他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刷朋友圈。周宇发了一张照片——他在新公司年会上拿了年度技术贡献奖，照片上的他在台上举着奖杯，笑得极其张扬。陈旭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他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沙发

上。他脑子里出现的是一片无法被反驳的、均匀的、弥漫的空白——那种感受不是“我输了”，而是“我不知道我如果没考编，我会是什么样”。那个“没考编的陈旭”从来没有被生出来过。他二十七岁那年就把未来三十五年预支掉了，所以那个“没考编的陈旭”连一个可以站立的当下都没有。他根本无法比较“现在的我”和“可能的我”——因为“可能的我”已经被他亲手注销了。陈旭在那天晚上失眠到凌晨三点。他没有在凌晨三点决定辞职。他在凌晨三点确认了一件事：我不知道我这十年做了什么。而那个“不知道”，没有任何人可以回答——因为他这十年确实没有出过事，而“没有出事”本身，不是一件可以被讲述的事。

机制分析：叙事连续性断裂的独立发生机制。这是前两次结算在时间中累积出的最终后果。2020年那一次，他固化了一个否决器——“我不适合”。2022年那一次，那个否决器被自动调用、替他完成了对方案的无声否决，他不需要重新决策。两次下来，他练习的不是“放弃选择”，而是省略决策过程本身——让否决自动发生。到了2024年凌晨三点，他回头看时，发现自己回望不到任何一次他曾面对一个岔路口、犹豫过、然后用自己的判断力扳动道岔的时刻。他能回望到的，只有一张早已批好的未来支票，和十年如一日的、每月从工资卡上划走的两千一百元月供。他要给自己讲一个“我这十年是怎么走过来的”故事——但他找不到任何一个讲故事的动词。银行替他做了购房决策，岳父替他做了婚姻安全的背书，父亲那杯酒替他做了“不能辞职”的终身承诺。他在自己人生的每一个重大节点上都拥有最优厚的确定性——他唯一没有的，是为自己做出一个不可撤回的判断的经历。而人需要这种经历，不因为它有用，因为它是“我是一个人”这个基本叙事的唯一可用动词。那天凌晨他把手机扣在沙发上——那个动作，是他对“我这十年没有一个动词可讲”的无声认账。这就是体质化剥夺在十年累计后结算出的最终后果：他不是被禁止讲述自己——是他想讲的时候发现词库里“我选择了”这个词条，十年前就被预支装置替他签收了，他一次都没用过。

（三）外部债务与内部叙事塌陷的严格区分

现在，必须正面处理一个本文此前未严格区分、而一旦区分开来就会逼出更深洞见的问题：陈旭走不掉，到底是因为外部债务——房贷断供、婚姻危机、父母失望——还是因为内部叙事的报废？如果外部债务可以被社会性地解决（比如他的妻子告诉他“没关系，你辞职我也支持你”；他的父亲告诉他“时代变了，那杯酒不作数了”；银行有了个人破产制度），那么他内部的叙事报废是否还会发生？

本文的回答是：它会。内部叙事报废不是外部债务的内化版本，而是一个独立的发生学过程。它的独立性的证据在于——一个人即使外部债务全部清零，他仍然要面对一个无法被任何外部谅解所覆盖的问题：“我这十年，不算数了吗？”这个问题不来自银行的催收电话，也不来自妻子的责备，甚至不来自父亲的沉默。这个问题来自他自己对“人生叙事”这一基本人类需求的内在要求。人不仅是活着的——人是需要把自己活成故事的。一个人在任何时刻回头看自己的过去，都需要能讲出一个“我从那里走到这里”的故事——这个故事不需要是成功的，但它必须是连续的、可以被讲述的、并且在讲述的过程中能让讲述者确认“我是同一个人”。身份预支的结构破坏的，恰恰是这个连续性。一个人在入编的那一年就用“今后余生不会出事”这张支票买断了未来的叙事权，今后十年他的每一天都只是在确认同一句话：“我还在岸上。”十年下来，他回头看的时候，看到的不是一条路，而是一个点——那个二十七岁上岸的自己在原地站了十年，旁边没有任何分叉的路标。他无法讲述“我是怎么从那里走到这里的”——因为没有走，他是一直站着的。这个困境不是认知失调——它

不来自“我的选择是否正确”的认知矛盾，而来自“我是否还有一个可被讲述的人生”这一更深层的问题。前者可以通过调整认知来恢复平衡，后者则是一种发生在叙事本体论层面的断裂——他丧失了确认自己是一个连续行动者的叙事凭借。因此，即使外部债务全部清零——即使妻子告诉他“你辞了我也不离”，即使父亲告诉他“那杯酒你当我没喝过”，即使银行告诉他“你的贷款可以用个人破产法处理”——他内部的叙事报废依然会发生。因为那些外部谅解都无法替他回答那个午夜的问题：“我这十年，不算数了吗？”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回答者——他自己。而他自己的那套叙事语言，已经在十年的体质化剥夺中报废了。

这才是身份预支最深的代价。它不是让一个人欠了还不清的债，而是让一个人丧失了讲述“我这辈子”所需要的最基本的叙事语言。预支最终摧毁的，不是安全，而是叙事。

六、思想实验：当“预支”的通路被逐一关闭

到此，本文已经完成了对“身份预支”的机制描述、代价分析和叙事报废的揭示。如果这个分析站得住，就应该经得起一个思想实验的检验：逐一关闭编制身份预支所依赖的那些“兑现接口”，看编制本身会发生什么。更进一步——三大接口之间不是平级的，有没有一条具有底层地位的接口，一旦被关闭，另外两条即使不动也会逐渐松动？本节将尝试不同的关闭顺序组合，以测试三大接口的层级结构。

（一）关闭房贷审批接口（底层接口，首先关闭）

第一刀，砍向最硬的那个接口。假设银保监会出台一项明确规则，要求所有住房贷款审批必须以个人真实的银行流水、纳税记录和个人征信报告为唯一风险定价依据，禁止将“单位性质”作为调整利率和额度的变量。银行不得因申请人是公务员而给予更低利率，也不得因申请人是私企员工而上浮基点。这个规则不是空想——在许多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房贷审批的主要依据确实是个人信用记录和真实收入水平，而非雇主的体制属性。

这一刀砍下去的直接效应是：编制身份在金融系统里那份被提前预支的“未来信用”，当场注销。一个月薪四千的公务员和一个月薪两万的程序员，站在银行柜台前的模样会变得差不多——甚至程序员因为真实流水更高、未来收入增长曲线更陡，能贷到的额度反而更多。编制靠“低薪高贷”扭曲机制获得的住房购买力优势，将归零。一个人在决定是否考编时，不再能把“更好贷款”作为决策参数之一。

但房贷审批接口的关闭不仅仅影响金融维度。它在三大接口中具有底层地位——因为它是唯一一个直接兑换为物质利益的接口，而另外两条接口的运作，都默会地依赖着这条物质地基。婚恋市场上，编制身份的可共享性之所以有说服力，不只是因为“他是体制内的人”这个标签好听，而是因为这个标签背后接着房贷那一整套低息、高额度、三十年固定还款的物质保障。一旦房贷审批接口被关闭，“有编制”在婚恋市场上就不再意味着“你俩婚后能更容易买房”——它退化为一个单纯的社会标签，而标签本身不产生月供。代际期望同理。父母推荐子女考编时，他们心里那笔账不光是“这工作稳定”，更是“稳定工作的房贷好批，他以后不会居无定所”。如果房贷审批不再区别对待，父母对编制的执念就会失去它最物质性的、最可被清晰计算的支撑——他们仍然会担心市场风险，但这个担心不再有一个“考编→买房→安家”这条最短路径来瞬间平仓。

因此，当房贷审批接口首先被关闭时：婚恋市场上编制的溢价不会立刻消失，但会开始松动——“编制”和“买房能力”之间的默认联结断裂后，它需要被其他的物质证据来填补；代际期望不会消失，但会失去最锋利的那把刀——父母劝考时不再能说“有编制才能买房子”。两条线的松动都是从这条物质地基的沉陷开始的。

（二）关闭婚恋市场接口（第二条关闭）

第二刀，砍向第二个接口。婚恋市场中编制的溢价，根植于编制身份所携带的未来承诺的“可共享性”——你和一个有编制的人结婚，你获得的不仅是一个配偶，更是一个被国家背书的、可以共享的未来确定性。削弱这种优势的路径，不是立法禁止相亲角标注“有编制优先”，而是让市场上的其他职业身份也开始提供同等程度的、可被婚姻共享的制度性保障。

这可以以多种方式逐步发生：高收入市场从业者可以通过购买高额商业健康保险、建立可覆盖配偶及子女的家族信托、配置多元化的资产组合来为家庭提供不依赖单一雇主的长期安全网；私企高管可以通过与企业签订包含“配偶保障延续条款”的长期合同，在公司层面锁定一部分身份的可共享确定性；数字化平台经济中的高价值自由职业者，可以通过行业公会或专业协会建立跨雇主的福利接续机制。当这些替代性的“未来保障共享方案”足够多、足够可见、足够可信时，“有编制”在婚恋市场上就不再是那个唯一能提供“未来身份搭车”的通路。编制的身份预支在此丢掉了“可传递性”这一独有面额——它仍然是一张好本票，但不再是唯一能带人上车的本票。

值得注意的是，当婚恋市场接口在房贷审批接口已经被关闭的前提下再被削弱时，编制在婚姻中的吸引力退化的速度，将远快于两个接口各自单独关闭时的速度之和。原因在于，房贷和婚姻是联动的——以前一个人考编之后，他可以同时在这两个市场上一次性提取未来确定性，这构成了一个“复合兑现”的加速度：房子的低息贷款增强了他在婚恋市场上的竞争力，而婚姻的稳定性的又反过来让他更愿意承担长期房贷。一旦这两个接口被依次关闭，复合兑现的加速度消失了——编制身份退化为一个只能用一份工资、一份退休金来兑现的单一维度保障，而这是任何一个稳定的市场职业在配置适当商业保险和储蓄之后都可以做到的。

（三）关闭代际期望接口（最后一条自然衰减）

第三刀，砍向最难量化但影响最深远的那个接口。代际期望的预支力量，来自从大规模经济转型和下岗潮中幸存的那一代父母对市场信用的深度创伤记忆。这种记忆不是教育可以消除的，它只能随时间、随代际更替而自然衰减。当那些从未亲身经历过“整个厂区一夜之间变废墟”的年轻一代自己成为父母时，他们对“市场会吃人”的恐惧不会像他们父母那样切肤。因为他们自己就在市场中工作了十几年，虽然没有编制，但日子也过得去；他们的同事、朋友大多也在市场中，没有人被市场的浪潮吞没。这一代人对市场的风险认知，已经不是“它会毁掉你”，而是“它有时会起伏”——从“零容忍”到“可管理”，这种对风险的感知梯度变化，是所有代际观念变迁中最根本也最缓慢的一种。

这第三条线的衰减不需要任何政策推动——它是历史伤口的自然愈合过程，只是愈合速度以代际为单位。但这里需要指出一个关键的不对称：代际期望接口依赖于另外两条接口的物质运转。如果房贷审批和婚恋市场接口已经被关闭，那么代际期望的衰减速度会加快——因为父母那一代人在劝子女考编时，不再能援引具体、可量化的物质利益（“有编制才能贷款”），他们的话术会退回到一个更

模糊、更难以对下一代产生实际心理约束的层次（“反正体制内稳当”）。而“稳当”两个字，不带利率数字、不带相亲市场的权重排行时，它只是一句情感表达，不再是系统指令。

（四）三道刀痕之后的编制

三道接口都被关闭或显著弱化之后，编制还剩下什么？

它仍然有一套终身雇用的制度内核——只要你不出事，就不会被开除；它的养老金替代率仍然大概率高于市场平均；它的工作节律对于那些不善于也不喜欢市场竞争的人来说，仍然是相对舒适的选择。它还是一份好工作。但它不再是那个被所有关系线疯狂加固的、不可替代的、放大了几倍的“身份预支装置”。它从那个位置“松绑”了——它不会再逼迫数百万人在三十岁之前交出他们全部的未来去向，以换取一笔被提前批下来的身份贷款。人们仍然会考虑考编，就像他们仍然会考虑考研、出国、进大厂、创业一样——这是若干可选项之一，不再是唯一，不再是“上岸”。它回归为一份工作：一份不能轻易甩掉你、却也不能给你自由的终身职位。它的吸引力将回归理性——当一个社会不再把一个人的未来当作可以提前贴现的通货时，编制的真实重量将是一份安稳工作的正常重量，不轻，但也不至于压弯一代人的脊背。

七、结论：提前到站的未来，与它到期的条件

本文的核心论证可被重述如下：编制的真正分量，不在它当下的制度优势，而在它是当代中国社会中运作最顺畅的那一套“身份预支”装置——它把一个人尚未发生的、不可逆的今后余生，提前兑换为一笔当下可被社会识别、评估、使用的身份通货，并通过房贷审批、婚恋匹配和代际期望这三条彼此独立却恰好耦合的制度接口，将这笔通货反复兑现为具体的、可感知的生活利益。在这同一过程中，它同步启动了“体质化剥夺”——不是从外部禁止个体的选择，而是让个体在每一次主动选择“安全”的当下，都参与了把“不安全的选项”从菜单中移除的操作。十年累积之后，个体丧失的不是安全感，而是为自己的人生重新命名的叙事语言本身。编制的坚固，不在于它自己多坚固，而在于那三条接口不断朝它泵送未来，让它的当下始终是满的；一旦接口被关闭——尤其是具有底层地位的房贷审批接口被首先关闭——它显露出的质地只是一份终身雇佣：一份在很多社会都普遍存在、但不会让数百万人在三十岁之前交出全部未发生人生的职业契约。

本文的核心概念“身份预支”不是任何一种既有理论的当代翻版。它从经济学借了贴现的时间语义，但把被贴现的面额从货币扩充为社会身份与自我的完整性，并进一步揭示编制的未来确定性拥有一种无法被任何商业方案定价的“免检”质地——它不需要被检验，不需要被理解，不需要被相信，它在被看见的那一瞬间就已经被社会默契自动识别为可靠的。从布迪厄那里，它借了国家信用的背书权重，但把分析焦点从“资本兑换率”的结构逻辑推向了“未来被提前消费”的时间发生过程——布迪厄能解释编制为什么被高估，但不能解释它为什么能被提前兑现。从卢曼那里，它承认系统信任理论为“免检”特征提供了有力的结构性解释，但进一步指出系统信任只管“当下制度的免检”，不管“跨出当下、提前兑现未来时间”——前者是结构性的，后者是时间性的，这一区分是本文特有的理论增量。从福柯和戈夫曼那里，它借了规训和总体机构的权力运作图景，但填补了规训理论所无法解释的那个最热的起点——个体为什么在规训发生之前，就已经自愿地跑进那个规训自己的装置之中——并且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身份预支的体制化剥夺，其维持不需要持续的监视与考核，它靠的是

一次性签发的未来支票在三个社会接口上的连续自动兑现，让个体自己替系统看守自己。“身份预支”的独特性，恰恰在于它不是在任何一个既有理论上做增量，而是那个被既有理论们围住、却谁也没能单独命名的空心地带。

本框架的界限

在收束本文之前，有必要诚实划定本框架的适用范围与解释边界。第一，“身份预支”的有效域限定在社会结构具备“多接口高烈度耦合”条件的语境中——即未来确定性可以经由至少两个以上的独立社会接口（如金融、婚配、代际评价）被制度化地提前折现。如果一个社会的房贷审批不区分单位性质、婚恋市场不以职业身份为核心配对变量、代际评价不将职业安全作为主要的孝道兑现通货，则身份预支的机制即使存在，烈度也会极低，不足以构成一代人的人生纲领。

第二，本文解释的是“人们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追确定性”，而非“人们为什么追确定性”这个更普遍的、跨越文化与历史的基本人类需求来源。后者是人类学、存在主义心理学的业务范围——人在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时寻求确定感，这本身不依赖编制制度的任何特征。本文的独特贡献在于揭示：在当下的中国社会里，这种古老的人类需求是通过何种具体的制度耦合、在哪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作用下，被集中地、高烈度地凝结于“编制”这一个具体的结构节点上。

第三，也是本文必须正面处理的一个明显的外部挑战：很多国家都有公务员终身雇佣制度——德国的终身公务员制（Beamte）、法国的公务员法规（Statut général des fonctionnaires）、日本的公务员身份保障制度——它们的终身雇佣壁垒不可谓不坚固，但为什么没有出现类似中国这般程度的、跨代际的“编制崇拜”？本文的回答是：终身雇佣的制度外壳不是中国独有的，但“三大接口”同时高烈度耦合是独特的结构性条件。下岗潮的深度代际创伤（代际期望接口的高烈度激活）在德国和法国的战后历史上没有可比的对应事件；住房商品化改革后编制身份与银行信贷风控的制度性捆绑（房贷接口的金融创新）是中国在1990年代住房制度转轨中产生的特殊耦合，在德国和日本的住房信贷体系中，公务员身份虽然受青睐，但与信贷利率和额度之间的绑定程度远不及中国；社会职业评价体系的相对单一化——在市场转型初期的中国，高声誉的非编制职业通道尚未充分发育，近年来虽有改善但仍远不足以与编制的社会认知地位抗衡——使得婚恋市场上的编制溢价缺少被其他安全通货稀释的渠道。三者缺其一，预支的烈度就会下降；三者同时存在并高烈度耦合，才是当代中国“编制崇拜”烈度独异的深层结构性原因。这一区分本身，也应该被纳入本文命题的理论边界：不是终身雇佣创造了身份预支，而是三大接口的同时高度耦合，把终身雇佣这个普通的制度外壳，压铸成了一套能提前兑现未来三十年的预支装置。

现在面对那个最朴素也最不容回避的问题：当我们把尚未发生的未来提前拿到手中时，我们拿到的是什么？我们拿到的是一份确定——确定明天的房贷还得起，确定后天的家庭有依靠，确定父母闭眼之后自己还能被社会接住。这份确定是真的，不是虚假的安慰。

但是，“为自己定义什么才算值得过的一生”这种能力——它不是一颗被预支制度这块石头压在底下的种子。它从来没有作为某种先天的本质属性在人身上天然存在过。它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可能发生出来、也可能不发生出来的一种能力候选态——而让它得以发生出来的社会条件，恰恰是一个需要反复面对“我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但我必须在今天为明天做出一个不可撤回的判断”这种处境。预支装置关闭的，不是一扇本来应该敞开着的门，而是那套能让这种候选态有机会被发生出来的完整

社会生态——在那个生态里，人需要自己为尚未到来的明天做决定，承担那个决定可能出错的后果，然后在下一次决定时把这个后果作为修正参数。这是一套需要被反复练习的能力，而练习的场地，就是人生中那些“不知道明天会怎样”的时刻。预支的安全，替一个人打包收走了所有这些时刻。它不是在“压制”他——它是在替他过掉了那些需要他来过的生活。那个人不是在安全里“丧失了”什么本该有的东西——他是在安全里，从来就没有被放置进那个能让那项能力第一次被激活的处境之中。不是雨没下过——是他每一次在雨季来临前都给自己搭了屋檐。而搭屋檐的材料，正是那张他二十七岁那年签收的未来支票。

所以，回到陈旭的那个凌晨三点。他盯着天花板上那片被路灯染成橘色的光斑，他无法回答“我这十年做了什么”。这不是因为他记性不好——是因为他的人生叙事里，没有发生过任何一件需要他用“我”这个词来开头、用“我选择了”这个词来衔接、用“所以我现在成了这样”这个词来收尾的事情。他的人生故事不是被讲述的——是被批下来的。他手里那张未来支票，帮他付掉了房贷首付、婚恋权重、父母交代，但它的最后一行小字写的是：“持票人无须亲自讲述自己的故事。本票一经签发，故事权自动移交。”而他甚至从来没有翻到过那一面——因为那一面，是预支装置唯一不承诺兑现的条款。

本文的证伪条件同样清晰：身份预支的命题成立与否，取决于“未来确定性”是否确实构成了编制吸引力的独立维度，而非仅为其“当下制度优势”的附带情绪反应。这一命题容许被如下具体事实证伪：如果在中国社会，当房贷审批完全基于个人收入与信用记录、不再区分单位性质；当婚恋市场上，“有编制”的择偶权重回归至与“有稳定职业”同一量级；当年轻一代父母的创伤记忆代际衰减到不再构成对子女职业选择的强制性推力——在上述三条同时大部分成立的前提下，编制的吸引力回归至一份普通终身雇佣的正常水平，换言之，“考编热”大幅退潮——那么“身份预支”所描述的那种额外锁定效应将不成立。反过来，若上述条件已满足而“编制崇拜”仍然炽热，本文命题将被否证。

这同时也回应了一个严肃的现实主义反驳：如果编制的未来确定性确实有真实的制度基础——它的确比私企更不容易裁员，它的养老金替代率的确更高——那么编制的吸引力不就是对真实风险的真实避险吗？本文的回答是：没错，编制的未来确定性的一部分是真实的。但我们的分析不依赖于“它是虚假的”。它依赖于：即便它是真实存在的，社会接口也在将它“过度折现”——把一份“相对更稳定”的未来，贴现成一个“绝对不会出事”的当下身份，然后通过房产、婚恋、代际的多重杠杆，把它放大为一个远超其实际制度含量的身份通货。预支装置的核心运作，不是无中生有制造确定性，而是用一个真实的制度内核作种子，经由三大接口的连续放大，最终结算出一个被社会性的“免检”光环包裹的、几乎无法被理性评估的过度身份。这个放大效应本身，才是预支装置最需要被指认的地方——因为它的实际运作，遮蔽了人们对自己真实需要的评估能力。一个人当然可能需要一份比市场平均水平更稳定的职业，但他是不是需要预支到“今后余生”的尺度？这个问题，在预支装置持续运作的时候，从来没有人能冷静地问——因为那张未来支票已经在当下被折现成了房子、婚姻、父母的安心，而退票的代价，是整个生活的平仓。

注释

- [1] 李强, 2016, 《社会分层十讲》(第三版),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郑功成, 2018, 《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 理念、目标与行动方案》, 北京: 人民出版社。此处的制度主义路径涵盖中国社会学与社会政策领域关于编制内外社会保障差距的主要经验研究, 属于对既有研究方向的概括性归类, 而非对某一具体论文的原句引述。
- [2] 周其仁, 2017, 《改革的逻辑》, 北京: 中信出版社。理性选择路径在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中的典型体现, 参见该书中关于制度不确定性下的个体职业选择行为的相关讨论。此处的引述是对该研究方向的概括, 不涉及具体页码。
- [3] 金耀基, 2019, 《从传统到现代》, 北京: 法律出版社。文化解释路径在当代中国职业价值观研究中的体现, 参见该书关于科举传统与士大夫文化在当代的延续性讨论。此处的引述为概括性归类。

参考文献

布迪厄, 皮埃尔 (Bourdieu, Pierre), 1994, 《实践理性: 论行动的理论》(Raisons pratiques: Sur la théorie de l'action), 巴黎: Seuil出版社。

福柯, 米歇尔 (Foucault, Michel), 1975, 《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 巴黎: Gallimard出版社。

戈夫曼, 欧文 (Goffman, Erving), 1961, 《收容所: 论精神病人及其他收容者的社会处境》(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纽约: Anchor Books/Doubleday出版社。

金耀基, 2019, 《从传统到现代》, 北京: 法律出版社。

李强, 2016, 《社会分层十讲》(第三版),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卢曼, 尼克拉斯 (Luhmann, Niklas), 1968, 《信任: 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Vertrauen: Ein Mechanismus der Reduktion sozialer Komplexität), 斯图加特: Enke出版社; 第二版, 1979, 《信任与权力》(Trust and Power), 奇切斯特: Wiley出版社。

费斯廷格, 利昂 (Festinger, Leon), 1957, 《认知失调理论》(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斯坦福: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郑功成, 2018, 《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 理念、目标与行动方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周其仁, 2017, 《改革的逻辑》, 北京: 中信出版社。